

武润婷 著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J 202.40
W311 ✓

山东大学“211 工程建设”资助项目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

武润婷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武润婷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1

ISBN 7-209-02672-X

I . 中... II . 武... III . 小说史-中国-近代
N . I207. 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215 号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

武润婷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青岛胶南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3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9-02672-X
I · 35 定价:29.00 元

序

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它生存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小说相比，近代小说具有许多新的特色。诸如近代小说观念、创作主体、题材选择、叙事模式、艺术表现、传播方式等都发生了新变。近代小说是近代文学各门类（话剧除外）中受西方文学影响最显著的一种文体。

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胡适和阿英诸先辈学者就曾对近代小说作过许多开创性的研究。本世纪最后二十年，近代小说研究又有了许多突破。陈平原先生对近代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袁进先生关于近代小说变革的论述，以及更多的对近代小说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都为近代小说研究作出了新贡献。这些研究不仅为近代小说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阐释，补充了新的史料，而且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出现，这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这二十年，由海峡两岸学者编辑的《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以及小说家全集（如《李伯元全集》《吴趼人全集》）的出版，又为近代小说研究提供了可

靠的文本和翔实的资料。这对近代小说研究无疑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武润婷君研究近代小说有年，近几年，她又为近代文学研究生讲授中国近代小说，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这部专著，题为《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对中国近代小说作了系统的梳理与评述。作者将近代小说归纳为四大类：侠义公案小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和神怪小说，然后分类叙述其演变史。这种纵横结合的叙述框架，有助于揭示各类小说发展路向。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版的几部近代方面的小说史，由于学术目的和涵盖时限的不同，均未能包括近代（1840～1919）小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润婷君这部近代小说史是较全面地反映了1840～1919年间小说发展历史的一部专著，是对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贡献，值得欢迎和重视。

《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即将出版，润婷君要我为她的书写篇序，遵命写了如上文字，权作序吧！

郭延礼

二〇〇〇年炎夏写于

山东大学文学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编 侠义公案小说的合与分

第一章 侠义公案小说的开山之作《施公案》 (29)

 第一节 侠义公案小说的形成 (29)

 第二节 《施公案》的人物原型和成书年代 (33)

 第三节 《施公案》对市井细民心态的反映 (35)

 第四节 《施公案》的民间气息和世俗色彩 (42)

第二章 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三侠五义》 (47)

 第一节 《三侠五义》的成书经过和作者石玉昆 (47)

 第二节 《三侠五义》对明清公案小说的改造 (49)

 第三节 《三侠五义》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构思 (52)

 第四节 《彭公案》及其它侠义公案小说 (58)

第三章 《狄公案》等作品对清官断案的质疑 (63)

 第一节 实证主义思想的确立对公案小说的影响 ... (63)

 第二节 《狄公案》对清官断案的质疑 (65)

 第三节 《老残游记》对理学蒙昧主义的抨击 (70)

第四章 侠义公案小说向侦探小说的演变 (74)

第一节	西方侦探小说的传入和近代的刑律改良	(74)
第二节	《九命奇冤》对公案小说的改造	(78)
第三节	公案、侦探小说的合流《春阿氏》	(83)
第五章	我国民初的侦探小说	(92)
第一节	民初侦探小说的产生与特点	(92)
第二节	民初侦探小说的文学价值	(97)
第六章	侠义公案小说向武侠小说的过渡	(105)
第一节	《七剑十三侠》对公案小说的改造和对江湖世 界的描写	(106)
第二节	《仙侠五花剑》对官府的抨击和对侠客技艺 的神化	(112)
第七章	民国初年的武侠小说	(117)
第一节	民初武侠小说的繁荣	(117)
第二节	《江湖奇侠传》对江湖世界的展示	(120)
第三节	武侠与神魔交叉的《蜀山剑侠传》	(128)
第四节	侠情小说《荒江女侠》	(131)

第二编 近代言情小说的演变

第八章	《红楼梦》的续书和仿制品	(153)
第一节	《红楼梦》续书对《红楼梦》反封建精神的阉割	(154)
第二节	反对包办婚姻的《一层楼》《泣红亭》	(156)
第三节	《兰花梦奇传》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抨击	(161)
第九章	近代初期的“泛情论”小说	(171)
第一节	特定历史条件下“理”对“情”的压制	(171)
第二节	宣扬“泛情论”的《儿女英雄传》	(173)
第三节	《野叟曝言》《绿牡丹》所描写的英雄至性和 儿女真情	(181)

第十章	弘扬社会性情感的言情小说	(187)
第一节	特定社会现实对社会性情感的弘扬	(187)
第二节	结合国家危难描写爱情悲剧的《恨海》《劫余灰》	(189)
第三节	主张以社会性情感取代爱情的《自由结婚》	(196)
第十一章	主张婚姻自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200)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产生与特点	(200)
第二节	早期的“鸳鸯派”小说《碎琴楼》	(206)
第三节	主张婚姻自主的《孽冤镜》和《賣玉怨》	(212)
第十二章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代表作《玉梨魂》	(219)
第一节	徐枕亚的生平著述	(219)
第二节	《玉梨魂》对寡妇恋情的描写	(221)
第三节	《玉梨魂》的艺术特色	(226)
第十三章	苏曼殊的哀情小说	(229)
第一节	苏曼殊的身世和性情	(229)
第二节	哀情小说——苏曼殊深层心理图像的显影	(231)
第三节	苏曼殊言情小说的艺术特色	(239)
第十四章	近代初期的狭邪小说	(244)
第一节	狭邪小说的产生	(244)
第二节	《品花宝鉴》对狎优题材的描写	(247)
第三节	“改求佳人于媚优”的《花月痕》	(249)
第十五章	狭邪小说向社会小说的演变	(256)
第一节	近代狭邪小说的演变	(256)
第二节	将狭邪故事融入世情的《绘芳录》《梅兰佳话》	(258)
第三节	真实地再现妓院生活的《风月梦》	(265)

第十六章	狭邪小说的代表作《海上花列传》	(269)
第一节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和版本	(269)
第二节	《海上花列传》对妓院生活的真实反映	(271)
第三节	《海上花列传》对妓女形象的塑造	(275)
第十七章	狭邪小说的堕落	(288)
第一节	揭露流氓妓寮害人的《海上繁华梦》	(288)
第二节	作为嫖界指南的《九尾龟》和《留东外史》	...	(293)

第三编 近代社会小说的特点与演变

第十八章	近代谴责小说的先声《蜃楼志》和《镜花缘》	(318)
第一节	《蜃楼志》对洋商生活的描写	(318)
第二节	《镜花缘》对妇女问题和世风世俗的思考	...	(325)
第十九章	抨击晚清吏治的谴责小说	(332)
第一节	《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吏治的批判	(332)
第二节	《宦海》对广东官场的揭露	(337)
第三节	《老残游记》对清官的抨击	(341)
第二十章	谴责社会风气堕落的作品	(348)
第一节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世风堕落的批判	(348)
第二节	《负曝闲谈》《冷眼观》对道德沦丧的反映	...	(353)
第三节	抨击假道学的《梼杌萃编》	(359)
第二十一章	反映维新运动的谴责小说	(362)
第一节	抨击假维新的《官场维新记》	(362)
第二节	反映维新弊端的《文明小史》和《上海游骖录》	(367)
第二十二章	近代其它谴责小说	(375)
第一节	反映民族工业发展艰辛的《市声》	(375)

第二节 反映鸦片输入危害的《黑籍冤魂》	(381)
第三节 抨击封建迷信的《玉佛记》和《瞎骗奇闻》 …	(383)
第二十三章 近代的政治小说	(387)
第一节 政治小说的产生与特点	(387)
第二节 宣传政体改良的《新中国未来记》和《未来世界》	(390)
第三节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瓜分惨祸预言记》和 《狮子吼》	(393)
第四节 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小说	(397)
第五节 宣传科学救国的《月球殖民地》和《新纪元》	(399)
第二十四章 由问题小说向世情小说的回归	(402)
第一节 以科场状元和花场状元的爱情纠葛结构全书 的《孽海花》	(402)
第二节 通过家族兴衰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陵潮》 …	(411)
第二十五章 近代中后期的传记体小说	(422)
第一节 歌颂变法志士沈北山的《轰天雷》	(422)
第二节 歌颂秋瑾烈士的《六月霜》	(428)

第四编 近代的历史小说和神怪小说

第二十六章 描写时事的历史小说	(445)
第一节 《罂粟花》对鸦片战争的反映	(445)
第二节 描写甲午战争的《中东大战演义》	(447)
第三节 《新华春梦记》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抨击 …	(452)
第二十七章 讽喻现实的历史小说	(460)
第一节 《痛史》对宋代亡国教训的思考	(460)
第二节 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洪秀全演义》	(465)
第三节 《新三国》《新水浒》对社会改良的描写	(470)

第二十八章 近代其它历史小说	(472)
第一节 《历朝通俗演义》对传统演义小说的继承	...	(472)
第二节 寓教于乐的历史小说《吴三桂演义》	(476)
第三节 满足市民读者欣赏趣味的《清宫十三朝演义》	(480)
第二十九章 讽喻现实的神怪小说	(484)
第一节 讽刺拜金主义的《何典》和《活财神》	(484)
第二节 宣扬复仇精神的《蜗触蛮三国争地记》和 《逐日演义》	(487)
第三节 反映改良运动的《宪之魂》和《新封神传》	...	(489)
第四节 讽喻现实的神怪小说的艺术特色	(491)
第三十章 近代其它神怪小说	(494)
第一节 描写妖精作祟的《狐狸缘》	(494)
第二节 惩恶助善的《升仙传演义》和《八仙全传》	...	(496)
第三节 《绣云阁》《金莲仙史》等倡教之作	(499)
主要参考书目	(504)
后 记	(507)

绪 论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小说史上，近代小说应该是重要的一页。阿英说过：“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① 近代小说作品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多，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尽管其中没有像《红楼梦》《儒林外史》这样的名著，但许多作品也在当时的平民读者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具体说来，近代小说的创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侠义公案小说，第二次是谴责小说，第三次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这三次创作高潮，每一次都创作出大量的小说作品，每一次都在下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小说家们创作的宗旨不同，作品的风格迥异，但总体上看，都广泛地反映了近代不同历史阶段广大民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而通过这三次高潮所展示的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不仅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密切相关，也和西学东渐有一定的联系。

众所周知，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这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中西双方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方面的较量；其次是西方社会的组织形式、政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治体制对我国产生的影响；而最后是体现着社会成员的生活追求、价值尺度的各种观念形态的输入。侠义公案小说、谴责小说、“鸳蝴派”小说，分别反映了这三个历史阶段我国广大民众的生活感受和理想追求。

侠义公案小说热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山之作是《施公案》，代表作是《三侠五义》。这些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尚未挣脱封建意识束缚的平民百姓的生活与思想状况，富有世俗气息和时代色彩。

侠义公案小说内容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让侠客与清官联手治理国家。在这些小说中，朝廷和各级官吏，除了一名清官外，都平庸无能。“至圣至明”的皇帝实际上也只是一尊象征着权职的偶像，在经邦治国方面没有任何作为。国家之事，小到解决民事纠纷、维护治安，大到平叛御侮、保境安民，靠的都是清官和侠客的力量。清官与侠客比较，侠客的作用尤为重要，清官离开侠客寸步难行；而侠客只要奉了清官手中的尚方宝剑，就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侠义公案小说大都从清官断案写起，在断案过程中不断招徕侠客，等大批侠客聚集到一起之后，清官便渐渐隐去，由侠客们奉着尚方宝剑去征战厮杀，保境安民。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的百姓，总是把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在帝王将相身上。从《三国演义》对圣君贤相的期盼，到《杨家将》《龙图公案》对忠臣良将的讴歌，都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心态。然而，清中叶以来，随着“康乾盛世”红漆招牌的剥落和朝政的日益腐败，随着边患的日益增多和国内人民反抗运动的不断涌现，广大民众对封建统治当局在道义上、能力上都产生了怀疑，开始把寻求人才的目光投向社会下层。龚自珍“塞上似腾奇女气，汉东久陨少微星”(《夜坐》)的感慨，和魏源“刚散六千君子卒，五羊风鹤已频惊”(《寰海十章》)的叹息，都反映了这一点。侠义公案小说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草泽英雄身上，也说明了当时的

百姓对封建统治当局的腐败无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其次，侠义公案小说普遍反映了一种尚武精神和群体意识。窦耳墩、黄天霸、展昭、白玉堂、徐鸣皋等一大批豪侠的形象塑造得虎虎有生气。他们武艺高超，智慧过人，嫉恶如仇，敢作敢为，具有强烈的英雄气概和独立不倚的人格力量。只是有感于清官的清廉正直、忧国爱民，他们之中有的人投靠了清官，并在清官的率领下为国立功。他们公而忘私，精诚团结，从扶困救危、除暴安良；到平叛御侮、安邦定国，都寄托在他们的刀光剑影、拳脚相加之中，读来令人精神振奋。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在与西方列强的武力较量中屡战屡败，侠义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却愈战愈勇，所向披靡。应该说，是鸦片战争的失败激起了人们的尚武精神。而下层百姓不解“师夷制夷”和“西学为用”的强国之策，用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振奋国威的强烈愿望。

此外，侠义公案小说也反映了近代初期下层百姓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前的公案小说，旨在歌颂清官。书中都夸张地渲染清官们不同凡响的身世；写断案折狱，也主要是为了表现清官的清正和神明。侠义公案小说则有了明显的不同，同样写清官断案，其侧重点不在于清官，而在于表现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命运。这些小说所写的案件，大都是发生在市井之中的刑事案件，有的属于下层社会的民事纠纷。这说明，人们的审美视野，已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建功立业，转向了自身所处的市井生活之中。反映了下层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命运的深切观注。

侠义公案小说也有其思想局限性，即让侠客隶属于清官，“为王前驱”。对此，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分析。近代初期，新的生产关系尚未产生，小生产者虽然对封建统治当局在道义上、能力上产生了怀疑，但还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反封建思想。“为王前驱”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在古人心目中，国家、君王、朝廷三位一体，“为王前驱”就是为国出力。

尤其是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这种思想还带有相当的爱国的成分。因此，我们要指出这种局限，但不能无限夸大，把侠义公案小说视为“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作品。

由对圣君贤相的期盼到对下层社会力量的认可；由宣扬仁义道德的儒学传统到张扬尚武精神；由为清官循吏歌功颂德到对自己命运的关注，这就是侠义公案小说与明清公案小说最大的不同。应该说，侠义公案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列强进行武力较量中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下层民众的心态。

近代通俗小说的第二个高潮——谴责小说热，始于 20 世纪初。作品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等。其数量之多，来势之猛，又超过了侠义公案小说。掀起谴责小说创作高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庚子之变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极大愤慨。而庚子之变的第二年（1901），慈禧太后迫于压力，又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变法图强的谕旨，要求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各抒所见。”^① 在这种情况下，用文学抨击时政，既适应了广大民众宣泄痛恨政府误国的激愤情绪的需要，又顺应了朝廷的旨意，这是谴责小说兴盛的最根本的原因。其次，谴责小说的兴盛，又和当时广大市民的文化品味有关。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刺激，也由于我国的有识之士为了富国强兵而大力兴办实业，我国大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迅猛，市民人数骤增。近代都市文化的熏陶，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广大市民改变了文化娱乐的口味：他们对古老的、节奏缓慢的评书失去了兴趣；而钟意于简洁明快、信息量大的小说小报。大多数谴责小说，

^①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七辑《义和团档案史料》[3]，台湾文海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15 页。

就是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读者这种心理期待和文化需求而作的。正因为此，许多谴责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欧阳淦、高太痴等，同时又是某些娱乐性小报的主办者；而很多谴责小说作品，最初又都在这类小报上分期连载。第三，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推崇政治小说，提倡利用小说宣传政体改良，也为谴责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我国传统小说相比，谴责小说无论在创作观念上，还是在作品的风格上，都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传统小说大都把朝政得失、家族兴衰、人物命运作为中心内容。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隐含在历史故事和人情世态的描写之中。而谴责小说则自觉地把抨击朝政的腐败和揭露社会的弊端作为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构思，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的。《官场现形记》抨击晚清吏治的腐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评世风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老残游记》则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上，谴责封建官吏的顽固守旧和残忍；《市声》揭露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压制和摧残；《官场维新记》指责一些官吏借维新之名，求取荣华富贵；《黑籍冤魂》揭示鸦片输入对国人的毒害……这些作品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角度，几乎对近代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批判，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现实的宣传工具。

其次，传统小说大都以忠奸对立、善恶之争构成情节的主要矛盾冲突。在描写这些矛盾冲突时，又从奖善惩恶、寻求心理安慰出发，总是让正义战胜邪恶，以大团圆作为故事的结尾。鲁迅说传统文学的本质是“瞒”与“骗”，话虽尖刻，却也道出了其不敢正视现实的特点。谴责小说则不同，西方唯物主义思想的传入，清除了因果报应、宿命论等思想垃圾；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改良社会的责任心，又鼓起了小说家们面对现实的勇气。因此，这些作品直接以社会上的种种弊端构成情节矛盾，把现实社会中的

种种丑恶现象拿出来示众。以激励人们改良社会的决心和斗志。

谴责小说为自己特定的内容找到了相应的表现形式，它继承了《儒林外史》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风格，以宣泄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但因为读者大都是文化素养不高的市民，它又一变《儒林外史》那深沉、凝重、含蓄的风格，代之以浅显、直露、俚俗的特点。并夹杂一些话柄、笑料，以迎合市民读者的口味。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了小说的艺术价值，但却赢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喜爱。若从文学的宣传效应和文学艺术大众化的角度看，不能全盘否定。

谴责小说对社会的批判，很容易使人把它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联系到一起。然而，尽管资产阶级先驱人物的改良宣传对谴责小说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把谴责小说笼统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改良文学，却是错误的。事实上，谴责小说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只是就对中国社会“不良”的看法上取得了共识。至于社会何以会不良，如何改良，小说家们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有的主张反贪倡廉，整顿吏治；有的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改变社会风气；有的提倡西学，主张兴办实业；也有的人只是痛切地感到现实社会不好，却又提不出任何具体的改良方案。而真正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改良政体的，只是少数人。从总体上看，谴责小说是一种市民文学，它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时期广大民众的心态：一方面，西方列强的侵略，变法图强的失败，擦亮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对现有的封建政治的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产生了强烈的改良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准备的不足，他们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提倡的君主立宪制度还不能理解、接受。在批判社会弊端的时候，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普遍流露了一种悲观情绪。

近代小说的第三次高潮——“鸳鸯蝴蝶派”小说热，始于辛亥革命前夕，1913年徐枕亚推出其代表作《玉梨魂》，把这类小